

清文化丛书



王艳春 编著

盛京福陵

SHENG JING FU LING



沈阳出版社



亭
清文化丛书

盛京福陵

王艳春 编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京福陵/王艳春编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4 · 7
(清文化丛书)

ISBN 7-5441-2620-X

I. 盛... II. 王... III. 陵墓—简介—沈阳市
IV. K9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1088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辽宁美术印刷厂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75

字 数: 55 千字

印 数: 1-8 000 册

出版时间: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树权

封面设计: 冯守哲

版式设计: 霍明相

责任校对: 刘 捷

责任审读: 苏 红

责任监印: 杨 旭

定 价: 6.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邮购热线: 024-24124936

E-mail: sysfax - cn@sina.com



《清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总 策 划	刘迎初				
主 任	王世伟	王 玲			
副 主 任	周永诗	封兆才			
执行主编	周德礼	李树权			
副 主 编	金 鸥	霍明相			
编 委	张 杰	曲彦斌	张佳生	张志强	
	郑川水	耿 璞	何晓芳	佟 悦	
	姜相顺	王佩环	刘振操		
总 责 编	李树权				

目 录



1 福陵大观

1 天柱隆崇话神丘

5 吉壤造就开国陵

9 神域水法护风水

12 山水形胜八景生

15 福陵建筑

15 陵园标志石牌坊

19 神宫门户为正红

22 形神俱备石象生

25 排云一百零八磴

27 神功圣德一碑亭

30 方城门楼曰隆恩

34 隆恩大殿位至尊

38 专用配殿焚帛亭

41 棖星明楼月牙城

宝城、宝顶护宝宫 44

福陵人物 48

一代天骄清太祖 48

母以子贵是孝慈 54

被逼生殉叹大妃 57

迁入迁出富察氏 60

妃园寝内太祖妃 63

福陵管理 67

福陵管理典制备 67

舅姨子孙守福陵 72

福陵祭祀 75

汗陵祭祀初定制 75

清帝东巡祭礼恭 78



目 录



福陵大观

在沈阳古城东北二十里的天柱山上，在参天古木苍松翠柏的掩映之中，屹立着一座具有三百七十余年历史的帝王陵寝，这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开国者努尔哈赤及其后叶赫那拉氏的葬地——福陵。有清一代，其与盛京（今沈阳）昭陵、兴京（今辽宁新宾）永陵合称为“盛京三陵”或关外三陵，而在寻常百姓的眼里，因其位于沈阳城东，俗称“东陵”。建成伊始，福陵即以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建筑风貌和优美的自然环境闻名遐迩。

天柱隆崇话神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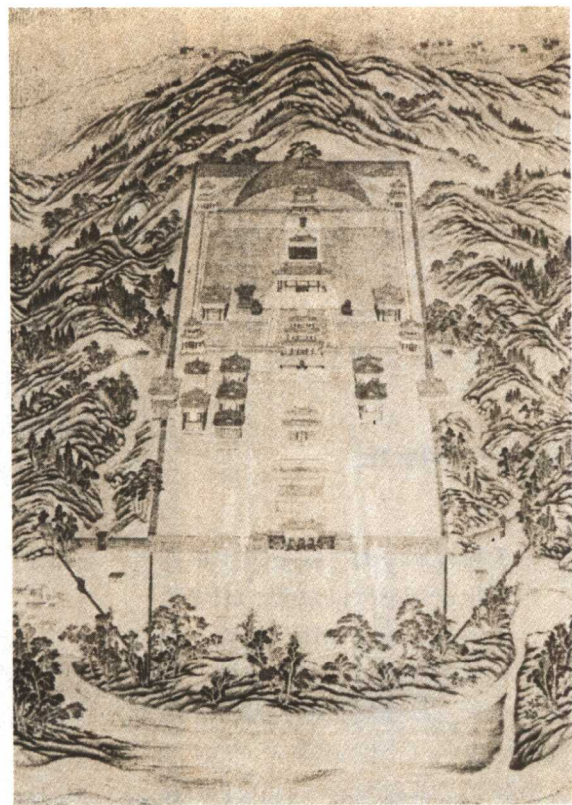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帝王陵寝从不封（没有封土堆即坟丘）不树（不植树木）到流行建筑高大的坟墓，或堆土为陵（如秦汉帝王诸陵），或因山为陵（如唐代皇陵），直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才一改前代遗风，帝陵建筑变成了宝城宝顶的形式，即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而使地宫成为高出城墙的一个圆顶神丘。天柱隆崇，巍然在望。福陵作为清朝入关前修筑在天柱山上的开



国帝陵，一方面呈现出其自身民族传承和地方习俗的风格色彩，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其秉承明朝陵寝制度的时代烙印。

不见万里长城，不识中国之大之广；不见皇帝陵寝，不知君王之威之尊。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清太宗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将太祖陵定名为“福陵”，满

清廷绘制《福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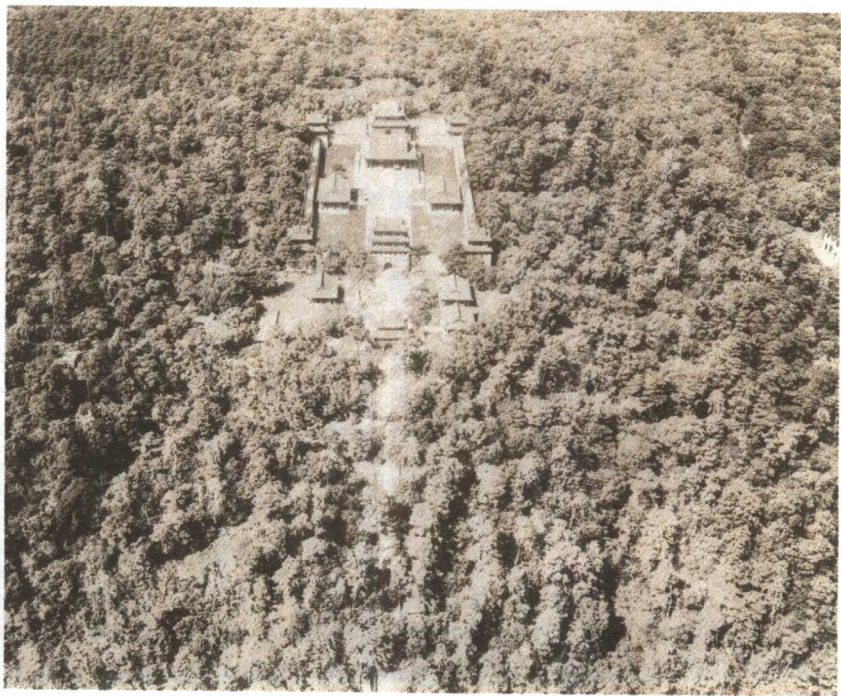
语称“瑚图灵安阿蒙安”，从此，福陵就成了清朝第一个获得正式名称的帝王之陵。它创建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在经历了太宗时期的草创、顺治时期的增建、康熙时期的完善后，其建筑規制呈现出别具一格独特风貌。福陵占地五百公顷，建筑布局因天柱山地形呈前低后高、南北狭长之势，由南向北依次为大红门、神道石象生、一百零八磴、神功圣德碑及碑亭、方城之隆恩门、隆恩殿、大明楼和宝城、宝顶，构成了一座金



顶朱垣气势非凡的开国帝陵。不仅如此，在福陵主体建筑的周围还环绕着郁郁松柏，正所谓万松夹道，岁寒不凋，为庄严肃穆的福陵增添了些许神秘浪漫的氛围。福陵置身于郁郁葱葱松海之中的景致美不胜收，以福陵松海为主题的自然景观，如“天柱排青”、“天柱神松”等被列为“沈阳八景”、“沈水十景”之中，人们徜徉其中，流连忘返，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更是对此吟咏赞叹不已。

在大清王朝开国之君的陵墓中，祔(fù)葬着努尔哈赤的许多后妃，如孝慈高皇后孟古姐姐、大妃阿巴亥、继妃

福陵鸟瞰





袞代及寿康太妃等。所以清代福陵的范围与今日不同。据史料记载，顺治、康熙时就已明确划定了陵区的保护范围，从外到内依次设立青、红、白三色三层木界桩作为警示标志，至乾隆时期更是有增无减。大清律法明文规定：红桩以内不准动一株小草，白桩以内禁止樵采，青桩以内禁止烧造（即不许在此范围内取土烧造砖瓦），以防破坏大清祖陵的风水。因此，福陵周围方圆二十里以内均是禁地，陵园界址的周长达二千九百六十丈。此外，环陵寝正门立有栅木一千零五十四架，陵东西两侧还有界碑四座、下马碑六甬，到处壁垒森严，显示出帝王权势至高无上的威慑力。当然，福陵也一直得到后世帝王的尊崇及妥善管理。祭祀是福陵最奢华也是最繁缛的礼仪活动，分大祭、小祭等多种类型，每年例行三十余次。特别是清入关定鼎中原后，从康熙十年（1671年）至道光九年（1829年）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皇帝先后十次东巡故里，均亲到福陵举行隆重的祭陵大典，体现了清帝们以孝治天下、首重山陵的统治思想。

清朝对于福陵的管理，在经过入关前的草创时期后，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形成了以总管衙门和掌关防衙门为外在形式的两套陵寝管理体系，前者主要侧重于守护陵寝的武职机构，后者为具有管理祭祀、备办祭品、负责陵寝陈设以及修缮陵寝建筑等各项职能的文职机构，使福陵得到了有效的双重保护。但自清末起，国势衰微，经历了日俄战争、伪满洲国和民国时期等连年战乱的福陵，一度从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沦落到断壁残垣、满目荒凉的神丘。新中国建立后，福陵作为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受到了人民政府的重视与保护，政府多次拨款对其修缮，重修或翻修了包括大红门、神道、神桥、一百零八



磴、大碑楼、方城城墙、角楼、隆恩殿、东西配殿、大明楼、宝城、宝顶等在内的一系列陵寝主体建筑，恢复和保存了清福陵的历史原貌。1963年，福陵成为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务院公布福陵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7月1日，经世界遗产大会批准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

如今，在人与自然日趋和谐的新世纪，拥有得天独厚人文和自然资源的古老福陵也焕发了青春，作为一处山川自然美与建筑人文美有机结合、浑然天成的旅游胜地，其正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为展现沈阳乃至中国所特有的民族文化而绽放着夺目的光彩。

吉壤造就开国陵

清入关前，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均未于生前择定万年吉地，都是死后由嗣皇帝为其选址营建陵寝的。而福陵作为清朝修建的第一座帝陵，虽典制未备且规模有限，但却独树一帜、别具特色，称得上是一处天造地设的上佳吉壤。其实论始建年代，福陵晚于永陵；谈建筑规模，福陵逊于昭陵，但只有福陵的陵寝建筑是营建在天柱山巅，使其成为清关外三陵中最巍峨壮观的一座帝王神丘。“天柱巍峨岳镇东，桥山佳气郁菁葱”。作为道光皇帝御制诗中主角的天柱山，是如何被皇太极选中而营建开国之陵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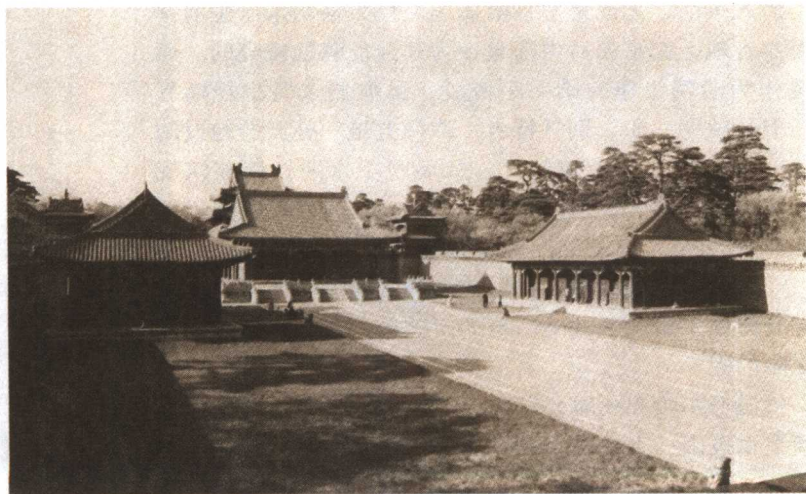
传说努尔哈赤死时，天柱山还叫石咀头山。即位的天聪汗皇太极因一直未能找到一块称心如意的风水宝地来安葬父汗，心中十分着急。一日，皇太极狩猎路过石咀山



麓，忽见山顶紫云缭绕，佳气葱茏，就起了登山之念。当他攀上山顶时，只见一条长蛇和一只雉鸡正在嬉戏、争斗，祥云瑞气就是因它们而起。看见有人来了，雉鸡展翅飞上九霄，长蛇则化为一道光柱直冲云端。见此情景，皇太极立刻命人在山巅立巨石作为标记，因为龙凤相争之处必为福地。既是天生吉壤，以此作为父汗的万年吉地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此后不久，便在此启建山陵，将老汗王努尔哈赤葬在了这里。又因长蛇化为了天柱，就将此山更名为天柱山。

还有一段传说称在皇太极发愁找不到风水宝地时，钦天监大臣启奏说，沈阳城东的天柱山乃是长白山的余脉，它背靠大台山，中间还夹着一道兴隆岭，是常言说的“两山夹一冈，辈辈出皇上”的好地方，但必须要找到山上的一百眼清泉后，才能安葬先汗的龙体，只有这样，江山才

方城内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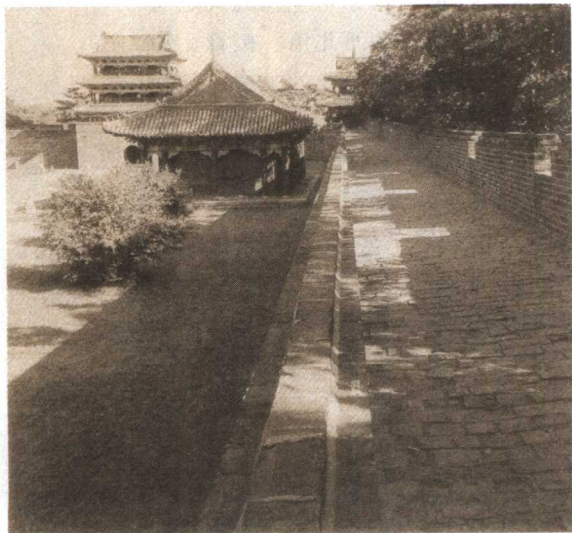
能一统万年。皇太极听后，急忙点齐一百名御林军，以百天为限去找那百眼山泉。在第九十九天时找到了九十九眼山泉，可第一百眼山泉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翁出现了，他说，天柱山上的一百眼泉水构成了一条天龙之形，而这第一百眼山泉乃是百泉之首即龙头所在，这眼泉冬季热气氤氲，夏日彩虹由此泉升起，自己已守护这条龙脉多年，现在他愿意说出来以保大家性命。在他的指点下，人们终于找到了这至关重要的第一百眼山泉。于是，天聪汗皇太极就在天柱山上修建了福陵……。传说是美丽的，但传说的背后告诉我们：封建帝王建陵的本质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肯定，是为了强化皇权，巩固自己统治地位，以求得江山能够千秋万代永固。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老百姓修陵之苦。

事实上，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驾崩时，太祖陵确实尚未营建，故天命汗努尔哈赤与生殉的大妃乌喇纳喇氏等只好暂时安葬在沈阳城内的西北角。接着，为父汗选定吉壤的“大业”就在天聪汗皇太极的主持下开始了。历尽千辛万苦，位于沈阳城东北的石咀头山被选中了。石咀头山位于长白山余脉末端，其背倚辉山，主峰高耸，两侧山峰逐次低下，前临支流充沛的浑河，视野开阔，大有所谓万山拱卫、众水朝宗的帝王之象。在此建陵，定能国运兴盛，帝祚绵长。天聪三年（1629年），太祖陵告竣。皇太极隆重地将太祖努尔哈赤葬在了石咀头山陵寝，一同安葬的还有其生母孟古姐姐和努尔哈赤的继妃富察氏。从此，这里就被称为太祖陵或先汗陵。随后，皇太极就在太祖陵的两旁设立了下马坊，以此作为进入先汗陵的标志性建筑。天聪八年（1634年），又开始建太祖陵的寝殿用以祭祀，在陵内广种松树，并由礼部提出在



陵墓前立石狮、石虎、石马、石驼之议。崇德年间（1636年—1643年），福陵形成了外部环以砖城、其门楼为三层、内有面阔三间的布瓦寝殿的格局。从陵寝的规制看，尚属简陋，但寝殿周围修筑砖城且门楼为三层，明显具有其本民族生活习俗的特点，而立石象生之举则是承袭中原古制。清入关后，福陵规制逐步扩大，顺治七年（1650年）立石象生，在神道两侧增设了卧驼、立马、坐狮、坐虎各一对，以及擎天柱四根、石望柱两根，还扩建了祭祀用的寝殿。顺治十六年（1659年），在砖城四隅修筑角楼，更换石象生基座等。应当说此时的福陵与初建时的差别不大，主要是对早期的福陵建筑规制的进一步完善。但到了康熙时期，福陵的建筑格局和面貌发生了重大的改观。

方城城墙与马道



康熙年间，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汉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清圣祖玄烨在福陵原貌的基础上，依明代陵寝制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建，形成了今天这样建筑总体面积达十九万四千八百平方米的陵寝建筑体系，不仅开创了清陵体制的先河，同时还保留了福陵原有的区别于



关内清陵的特点，如其方城为城堡式，隆恩门门楼高达三层，四周设有角楼等，均为关外盛京福、昭二陵所独有。其营建的具体顺序是康熙二年（1663年），奉安太祖高皇帝和孝慈高皇后宝宫于地宫，建宝城。康熙三年（1664年），太祖谥号碑立于陵前。康熙四年（1665年），修筑大明楼。康熙五年至六年（1666年—1667年），修筑方城之月牙城。康熙十六年（1677年），重修隆恩殿。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建神功圣德碑亭，并在碑亭内恭镌立神功圣德碑。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重修隆恩门。至此，福陵的主体建筑已全部建成。乾隆年间，几乎所有的福陵建筑都被重修和拆修过。因此，福陵的面貌在经历了近百年后，形成了清入关前后的陵寝建筑风格共存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福陵是清朝第一个获得正式名称的皇帝陵寝。清太宗皇太极将父汗的陵寝定名为福陵，其寓意是希望大清江山福运长久。至于石咀头山更名为天柱山，寓意福陵犹如擎天玉柱，支撑起大清江山的国运，则是顺治八年（1651年）的事了。

神域水法护风水

根据中国古代风水学说的理论，福陵所在的天柱山是天生福地，以陵寝作为主体，福陵正前方一定要有一条河来呼应，而犹如玉带般横亘于陵前的浑河就是使福陵日臻完美的重要条件之一。有清一代，为了保护好祖陵神域的风水，清廷曾大费周折地多次营建水法。



所谓水法，是清代对在福陵陵前所修防洪设施的统称。浑河发源于吉林省的纳绿窝集，与抚顺地区的苏子河及沿途诸山之水汇集后流入沈阳境内，其流到福陵之前时常常因水流量骤增而泛滥成灾，所以清朝为祖陵风水之计，在福陵之前沿浑河岸边修筑了一系列防洪设施，又称水法。在清廷绘制的《福陵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系列防洪设施的名称与方位，即有引河两处、石泊岸两处、虎皮沟堤一处和圆唇一处。这些保护福陵风水的防洪设施组合起来十分像射箭用的“弓”的形状，福陵正门面对的就是“弓弦”部分，即条石砌就的虎皮沟石堤。石堤为东西向，长约一里有余，高约五丈，呈台阶式，各级间距约为一尺，共计五十余级。虎皮沟的东、西、南三面则用土石垒成弧形堤坝，是为“弓背”。其中，东西两面的石堤犹如虎皮沟石堤伸出的两个臂膀呈环抱状，又称东西石泊岸。而南面顺水石堤拦水坝则全部为石块包砌，称作圆唇。东西石泊岸两侧各有一条引河，做导引山洪入浑河顺畅流过福陵之用。

由史料得知，福陵水法并不是同期修筑完成的，而是各朝累积营建的结果。最初修建这些水法，是为了使福陵神域的风水蕴璧合而珠圆之意。但自雍正朝始，每逢夏秋雨季来临，泛涨的浑河水常常使福陵正门前积水漫溢。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盛京工部侍郎魏廷珍会同福陵总管及掌关防官一同查看后，奏报皇上，称福陵前的疏水河沟因年久失修已被淤沙填满，若夏秋阴雨，浑河水必倒灌危及福陵。雍正帝闻奏，认为事关福陵风水，必须派一通晓地理之人前往福陵做全面勘察后，方可决定如何修浚。故特命精于堪舆学问的福建总督高其倬赴盛京福陵敬谨相度风水，以期获得解决的良策。高其倬能得到雍正帝



如此青睐，决非偶然，因为雍正帝本人建于京畿易县太平峪的万年吉地（即泰陵）就是高其倬为其相度而被雍正帝选中的。同年八月，高其倬勘察后奏称，福陵风水与永陵共祖同源，祥瑞之气顺浑河之水而来，无峰不拱，无水不收，是最善之地。所以，福陵水法一定要重修，因为浑河多年泛滥成灾，已使水流稍稍改了故道，水由夏季溢上而流，使得福陵风水中的可抱之势微觉外张，所以要修一石堤使浑河循故道而行，以期合皇陵“水抱沙圆”的标准而更增吉庆。雍正帝对此言听计从，特委派平郡王福彭前往盛京实施。临行前，雍正帝嘱咐平郡王，福陵工程关系重大，勿省工，勿惜费，只求工程坚固，不负敬祖爱民的深意。在福彭的督导下，共修引河一道，疏水河沟两道，建拦水堤坝一处，其前建所谓圆唇一处，使浑河之水重循故道，水法终于护住了福陵的佳气。但由于地理原因，一到雨季，作为支流的诸山之水同时汇集涌入浑河，其水势来流大，又因是山水而上流高，极易冲堤溢岸，实在是难以控制。所以有清一代，福陵的水法包括石泊岸、虎皮沟、圆唇等始终处于今岁补修、明年复冲、明年加工、后年又决的状态而无法得到根治。

清朝末年，日渐衰微的清政府已无力维修祖陵的水法而只能任其自生自灭。宣统三年（1911年），盛京当局为引浑河水灌溉城西水稻，开凿了一条“新开河”，新开河的前段即从福陵陵前通过，故福陵前的部分水法被拆毁。至此，守护福陵风水的水法寿终正寝。其实，福陵所遇到的这种水患永陵也有。封建统治者建陵讲究人与大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关系，是值得肯定的，但违背自然规律而刻意追求某种风水的达标，则注定了其结局的无奈。



山水形胜八景生

福陵之美，有口皆碑。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初六日，清康熙帝玄烨在第二次东巡故里恭祭福陵后，就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瑞霭钟灵阙，晴烟绕阙（mì）宫。

万山皆拱北，百水尽洄东。

夭矫盘峰秀，纡回磴道通。

俯看环众象，遥睇极高崇。

松柏丸丸直，冈峦面面同。

这首诗对山水形胜的福陵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其对福

隆恩门远眺

